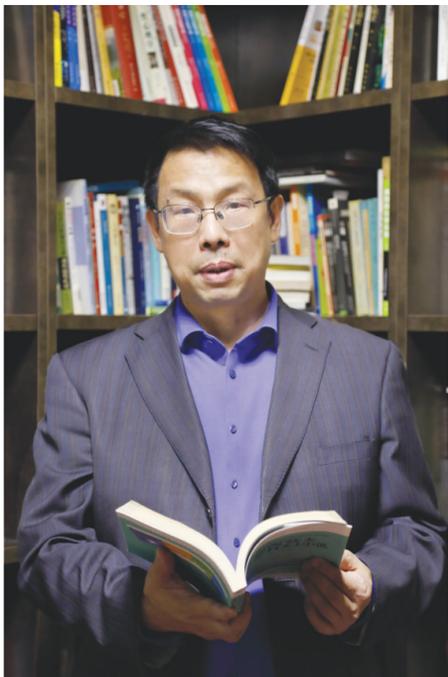


尹传红 文字有味 科学真美

文 王小柔



尹传红在他的书房 摄影 蔡明仪

成为阿西莫夫“粉丝” 在天津商学院读书

尹传红言及少年时代经历的三大幸事,注定会影响自己的一生:一是有一位慈祥优雅、他深情挚爱的妈妈;二是有充分尊重他的意愿、激励他奋发向上,并为他提供各种学习条件的父母;三是通过科普图书“结识”了阿西莫夫和叶永烈,由喜爱他们的作品而走进了科学的世界。

享誉世界的科普、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作品自上世纪80年代翻译进入中国后,受到中国科普界的推崇,赢得了较高的声誉。阿西莫夫几乎成了科普和科幻的代名词,堪称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科普作家。少年时代大量阅读阿西莫夫的作品,改变了尹传红的事业人生。

德国作家歌德曾感慨过:“当我读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第一页时,我的一生就都属于他了。”初中生尹传红第一次读到阿西莫夫的作品时,也有这样的感觉。1983年寒假期间,他在桂林姨家,从《知识就是力量》杂志上读到一则趣闻:1979年春天,美国有两家出版社争着要高价作家阿西莫夫树立一个重要标志——独家出版阿西莫夫的第200号作品。这个难题被作家以一种绝妙的方式轻易化解:他创作出一对“孪生子”,都算自己的第200号作品。结果皆大欢喜。尹传红就这样跟阿西莫夫打了第一个照面。

事有凑巧,第二天,尹传红走进一家小书店,在书架上随意扫了一眼,就发现了一本《阿西莫夫论化学》。出于好奇,他拿起书翻了翻,

告诉了他。那一刻,他的内心一阵狂喜,午饭都没顾上吃就直奔图书馆。这是他第一次以自己的科学偶像为话题撰写文章,也是第一次在《科技日报》上发表作品。后来,他收到30元稿酬,这笔钱抵得上当时他大半个月的伙食费了。过后没多久,他在《今晚报》上发表了评论《呼唤阿西莫夫》,还在《天津日报》上发表了几篇科普文章。

听从内心召唤 由职业跳转到事业

大学毕业从事食品科研工作一年后,尹传红“听从内心的召唤”,冲着阿西莫夫转轨改行,来到他心仪已久的科技日报社。之前他已了解到,当初他读到的那些阿西莫夫随笔的译者林自新,是《科技日报》首任社长兼总编辑,也是阿西莫夫著作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。

成为《科技日报》记者半年之后,1992年4月8日中午,尹传红从一位新华社记者口中得到消息,阿西莫夫已于前天离世。他惊讶万分,悲恸不已,当天晚上回到家里,找出自己珍藏的、平生读到的第一部阿西莫夫作品《阿西莫夫论化学》,反复翻阅,往事历历在目,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几天后,他在《科技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,这是阿西莫夫去世后中国国内发出的第一篇翔实的报道。此后,尹传红陆续撰写、发表了数十篇有关阿西莫夫的文章,并参与了《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》《宇宙秘密——阿西莫夫谈科学》等书的翻译、校译和编辑工作,成为国内众多“阿迷”心目中的阿西莫夫代言人。

阿西莫夫不但引导尹传红走进科学世界、开辟新的事业,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科学写作风格。在接受采访时,尹传红饱含深情地说:“阿西莫夫的诸多作品中,科学随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。这些风格独特、饶有趣味的作品大多从社会现象着眼,诠释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事件,背后呈现的则是广阔的科学与人背景。他不只是在普及科学,而且还努力让读者去思考科学、理解科学乃至欣赏科学,促使人们去考虑人类与科技、历史等方面的联系,考虑人类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,进而启迪人们扩大视野,创造性地思索未来,向未知的领域拓展。在他笔下,文字有味,科学真美!”

在科技新闻领域和科普天地纵横驰骋几十年,尹传红一直在思考——我们写的东西,是不是都能做到像阿西莫夫的科技作品那样简洁、晓畅、明白,不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?我们做的科技报道,是否能在科学和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,引发公众去认识理性思考的真谛?他觉得,自己做的是有兴趣、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情,也算是“反哺”曾经恩惠于他的科普吧。

实际上,科技新闻报道才是尹传红的本职工作,做科普最初只是业余爱好。尹传红回忆说,在采写了大量的科技新闻后,自己渐渐不满足于单纯地去写这项工作了。他发现:某些在当时看来很重要的东西,会随着社会发展逐渐丧失其价值和意义,如过眼烟云一般;而有些新闻背后的边角料,却往往值得挖掘、深究,能够以新的形

态不断地传承。

在尹传红的认知中,职业和事业是有差别的,他更想把工作当成一种乐趣、一项事业来做。他想要创作那种蕴涵思想意义、具有长久社会价值的作品。渐渐地,做科普这件事占据了他的大部分业余时间。虽时常被人调侃为不务正业,但他依旧我行我素,执着于自己认定的事业。尤其是参与创办《科普时报》后,他更深刻地感悟到,自己已经超越了“一个人的科普”,做起了大事业,“要让科普更有意义和担当。”

多一些科学阅读 少不得自然教育

从事科普普及、科学教育和科学写作多年,也结合自身学习、发展的实践,尹传红深感科学阅读和自然教育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性。

少儿时期的尹传红爱上科学,主要是因为父母的引导。父亲给他订阅了《我们爱科学》《少年科学画报》《知识就是力量》等科普期刊。尹传红读过的第一本科普书是《看云识天气》。他也记得自己11岁那年,从母亲给他买的高士其作品《你们知道我是谁?》当中第一次读到了科学诗,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诗中描述我们身边事物的形态,做了很多铺垫:“我来自遥远的天边,当冰雪融化的时候,我来了,我带来了温暖的阳光。”但是诗人此时并没有说出“我”究竟是谁,而是到最后才点明:“我是那一年的开始,我是新生力量的源泉,我是春天。”

尹传红记得,有一次他带着自己4岁的孩子在北京莲花池公园转悠,在一汪小溪边,发现有好多蝌蚪游弋。他惊喜异常,凑上前去仔细观察。身边的孩子却漠然以对、无动于衷。尹传红兴奋地给孩子讲起自己小时候抓蝌蚪、捉青蛙的经历,孩子眨着眼,像是在听一个远古的传奇。

尹传红觉得,今天的儿童生活存在“去自然化”的趋势,有所谓的“自然缺失症”,这种现象令人忧心、值得关注。孩子们热衷与电脑、手机为伴,却错过了本应与自然亲近的童年。其实,岂止儿童,成年人也一样如此。说来也就是一两代人,三四十年来,我们跟大自然似乎已漠然相隔,与山川、森林、溪流和原野渐行渐远。我们置身于物质充裕的信息时代,生命的信息却有所缺失,成了一种“穴居在钢筋混凝土丛林中的动物”。这倒真应了热爱自然的美国作家梭罗曾做出的断言:“我们都早早地和自然母亲断了奶,钻进了只和人交往的社会。”

2021年,在重庆挂职的尹传红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聘任为林草科普首席专家(首批12名),这让他感到意外。他将此当成是对他倾情自然教育和自然写作的一种激励和期待,要继续做更多的奉献。科学阅读是全民阅读的重要一环,要倡导孩子们增加科学方面的阅读,特别是关于生命科学、自然科学、健康卫生等内容的生命意识教育、生命价值教育、生存能力教育和死亡教育四大类图书。他也会一直呼吁,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,走进大自然。

对谈尹传红

分享科学奇美理趣 留下探索思考印记

王小柔:您在天津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,可不可以这样说,您今天事业的根基,就是在大学时代奠定的?

尹传红:是的。我非常喜欢天津,对自己大学时代的生活一直也心存感激。离开大学校园已经三十多年了,我还会时常想起“天南”诸多老师当年对我的关爱、鼓励和引导。我曾对“天南”的学子们建言:事在人为,大学阶段应该重视并搞好自己的人生规划,练好做人做事的基本功,特别要注意锻炼自己的社交、沟通和团结协作能力,努力探索切实有效的学习和工作方式。

王小柔:您从一名科研人员转型做报人,又长时间业余做科普,终于成为一位有影响的“科普大咖”,是什么样的动力促成了今天的您?

尹传红:我曾这样总结自己的过去——打小痴迷科普科幻,书香悦读一路相伴;分享科学奇美理趣,留下探索思考印记。我觉得,科普的功用主要体现在三个基本层面上:帮助公众理解科学;引导公众欣赏科学;促进公众参与科学。如果更进一步,那就是还能传播理性和发掘理趣。几十年来,科普一直让我乐此不疲,并且成就了我的第二事业和第二人生。在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已被看作是实现创新发展两翼的今天,我更有一种使命担当感,期待自己能够在科普创作方面拓展更大的空间。

王小柔:您怎么看待职业和事业,对您来讲有差别吗?

尹传红:我觉得职业和事业这两者的差别是很大的。我也深切地意识到,搞好自己的定位之后,执着不懈地去追求,对于成就一项事业是多么的重要!我的一位老领导曾引述一位美学家的话说:“事业艺术化,人生情趣化。”我特别赞赏这句话。一个人,如果能把自己心仪的事业当作爱好来做,这样的人生态度是不是很有意思?我想,我把自己的科技记者身份延伸为科普作家身份,实现的就是这样的转化吧。我一直坚持职业和事业上的创作,并且期望自己写的东西隔了些年头后拿出来再看,还不寒碜,至少能有点儿智慧启迪或思想价值,可以不断地修订、重印,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王小柔:您的科普文章《由雪引发的科学实验》被用作2022年全国语文高考乙卷实用类文本阅读材料,对此您觉得意外吗?

尹传红:确实感到意外。我寻思过,出题人出题的着眼点,应是如何从观察、思考中发现问题,并运用科学思维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,变未知为已知。这样的一个探索过程,往往也是科学精神的彰显。自己的科普作品能够在高考试卷上展示,我感到很欣慰,这给我的科普创作也带来了很大的激励和启示。

尹传红

科普中国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。致力于科普、科幻的研究及科学随笔创作,著有《幻想: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》《由雪引发的科学实验》等书。

讲述

上世纪60年代,16岁的人选八一跳伞队 青春献给祖国的蓝天

文 陈茗 崔艺凡

李俊秋是天津人,1963年被选入解放军八一跳伞队,成为一名伞兵战士。滚轮、旋梯、跳伞“三大魔鬼训练”练得她晕眩呕吐,跳伞时还曾摔入泥塘。但她把吃过的苦都变成了成功的喜悦。蓝天上,她曾是英姿飒爽的伞兵战士,退休后,又在河西区军休所发挥余热,描绘出一幅多彩的桑榆晚景。

16岁入伍当伞兵 难忘“三大魔鬼训练”

1963年年初,解放军八一跳伞队来天津招女伞兵,走进了天津女子六中。只有16岁的李俊秋首轮被选中,身高刚过1.6米,她稀里糊涂地去医院参加体检。上千人的体检场地和从未见过的测试项目,着实让她有点儿害怕。

“那次体检,可真是这辈子都忘不了。”李俊秋回忆,最考验人的就是坐转椅,测试你的防晕能力。人坐在转椅上,拿皮带绑住了,然后转椅飞速旋转,等停下来之后,解开皮带人站起来,向前走10步,向左走10步,向右走10步,立定。“我哇哇地往前

走,走直线也没晃,立定后稳稳站住。其他人可够热闹的,有摔倒的,有乱晃的,有晕得蹲在地上的,我嘛事儿都没有!”再有就是测肺活量,李俊秋一口气吹到3400毫升。成年女性正常的肺活量是2500毫升左右,16岁的她肺活量基本相当于成年男子了。视力、听力等其他各项指标也非常高,良好的身体素质让李俊秋从上千人中脱颖而出。

“1963年3月24日,是我入伍时间,让我一辈子难忘。”李俊秋回忆,那个乍暖还寒的春日,中午12点,妈妈帮她拿着行李,坐公交车送她到天津东站。部队负责接新兵的干部在那等着他们。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,是那列即将开往河南开封的绿皮火车。那是她第一次坐火车,趴在车窗前往站台上看,妈妈转身离去,慢慢走远了,留下一个单薄的背影……李俊秋忍不住哭了。

上世纪60年代,跳伞对大众来说是一个特别陌生的概念,李俊秋不知道等着她的将是什么,只相信那是一项光荣的任务。那一年八一跳伞队在全国特招了十名女伞兵,其中有七名来自天津。在部队,屈指可数的女兵可是相当耀眼的存在。当然,她们每个人的表现,也是部队官兵们关注的

焦点。除了踢正步、长跑等常规训练项目,每天躲不掉“三大魔鬼训练”,也就是滚轮、旋梯和跳伞。这几乎成了女兵们的噩梦,但李俊秋知道,只有拼命苦练,提高适应能力,才能确保实现精准跳伞。李俊秋解释说:“所谓滚轮,就是当你伸展四肢的时候,正好跟它那四个环接触上,手脚都被固定住,人推轮转,一旦转起来,靠的就是惯性了,会没完没了地飞快旋转。此外还有跳台,是一个高高的铁架子,上头一个梯子,下面一个梯子,中间是个转轴,人站在梯子上,也是用绳子捆好手脚,靠惯性带着人转圈。女伞兵吓得尖叫,但是教练不允许叫,都得憋着。饭也不敢多吃,因为转起来真的太晕了,肚子里有什么都能吐出来。”

人为制造眩晕,是为了让伞兵适应眩晕。此外还有跳台,属于伞降动作训练,是一项更枯燥、耗时更长的科目。水泥平台有三个高度,1米、1.5米、2米,从上往下跳的时候,要双腿并拢,全身紧缩,收腹,闭嘴收颌。女伞兵们分别从不同高度的平台往下跳,每天反复练习离机着陆姿势,摔得双腿肿得像馒头,身上晒得爆了皮。十名女伞兵全都咬着牙坚持下来,逐渐掌握了跳伞的基本要领。

跳伞时突然起了大风 落地后掉进泥塘

经历了几个月的强化训练,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能力提升了,对“空中一跃”有了莫名的兴奋和期待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,在教练的带领下,十名女伞兵穿戴好装备,排着队依次登上飞机。坐在机舱内,彼此都能从对方脸上捕捉到紧张和不安。飞机快速上升,穿过云层,透过舷窗,李俊秋看着地面上的房屋一点点变小,直至消失不见。由于当时她的体重还不到45公斤,所以教练安排她最后一个跳伞。飞机飞到2500米跳伞空域,舱门打开,强大的气流猛烈灌进机舱。身旁的伞兵一个个跳下去,李俊秋也慢慢挪到舱门口,耳畔呼呼的风声混合着自己剧烈的心跳声,她控制不住发抖的双腿,眼睛紧盯旋转跳伞灯亮起,耳边铃响,起跳——

“第一次从飞机上往下跳伞,印象最深的就是跃出机舱的那一秒钟。按规定,这次属于强制跳伞,身后拴着挂钩,降落伞会自动打开。我心里默念一二三,跳下去之后,翻过来天一片蓝,翻过去地一片绿,降落伞打开了,飘飘悠悠,忽然有一种女下凡的感觉。”李俊秋回忆。

八一跳伞队的主要任务是参加各类跳伞比赛,这就要求伞兵从飞机上跳下去之后要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,比如盘旋、翻跟头,最后定点跳伞,精准落地。如果说李俊秋的首次跳伞还算是完成了指定动作,那么第二次跳伞时,却因突然刮起一阵大风,让她严重偏离了既定路线。李俊秋回忆:“我从飞机上跳下来之后,被风吹

得失控,没飘到着陆地,而是飘到了远处村子里,落地时恰好掉进泥塘。我想往外走,结果越陷越深,吓得我哇哇大哭,心想这可如何是好!幸好有两个老乡大爷路过,连拉带拽地把我弄了出来。部队接应的人员很快就找过来了,因为跳伞后清点人数,发现少了一个人。”让她一生难忘的,是老百姓与子弟兵的鱼水之情,“我到现在也忘不了那两位救我的老乡,特别感谢他们。虽然嘴里也不知道该怎么表达,但那种感恩之情,让我铭记一辈子。”



年轻时的李俊秋(左)在部队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因腰伤告别跳伞队 参加国庆阅兵女兵方阵

“空降兵如同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,不练好跳伞誓不罢休!”这句话在李俊秋的心底留下深深的烙印,那次跳伞意外事件也成为她努力训练的不竭动力。“那时心里总憋着一股子劲儿,就得要跳好,跳不好誓不罢休。每次跳完之后,教练都给队员评判,比如跳定时开伞,必须精准到15秒以内。无论是比赛

还是战争,提前或者错过,都可能出现意外。跳一次不行再跳一次,我们的目标就是一定要赢得比赛,为部队争光。”

那时候部队还有一项规定,只要到跳伞部队来当兵,哪怕你是炊事员、饲养员,是文书,也都要跳伞三次以上。全师把一直不敢跳伞的七八个人集中起来,让他们跟八一跳伞队的女兵们一起跳。先由女兵第一个跳下去,紧接着让那些男兵跳,谁也不敢跳的,教练就给他踹下去。有女兵在场,那些男兵怎么也不能丢这个面子,再不心甘情愿、再害怕,也豁出去了。

因训练太过刻苦,李俊秋腰部受伤。三年后,她遗憾地离开挚爱的八一跳伞队,挥别辽阔的蓝天,调到空军医院工作。1969年,新中国成立20周年的国庆节,李俊秋作为女兵方阵中的一员,参加了国庆阅兵式。那段难得的经历,也成为她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。“那年8月,我们集中到首都机场训练。女兵都是从全军各单位抽调来的,干什么的都有。每天早上开始走方队,练得特别苦。吃早点时,大家都恨不得多吃点儿,因为练到中午都饿得不行了。午饭后休息一会儿,下午接着练。晚上在地下室打地铺睡觉。如此周而复始,所有的这些努力和汗水,都是为了天安门前的那一刻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段经历真的太难得了,比起内心的收获,当时受的苦根本算不了什么。”

1983年,李俊秋调入天津空军水上村医院。退休后,她在部队的关系转到河西区军休所,开始自学钢琴,加入了河西区军休所艺术团民乐队。“我一开始一窍不通,到现在已经能上台演奏了,真的不容易。我们经常到社区、部队给大家演出,也是回报社会、传递快乐的一种方式吧。”李俊秋说。